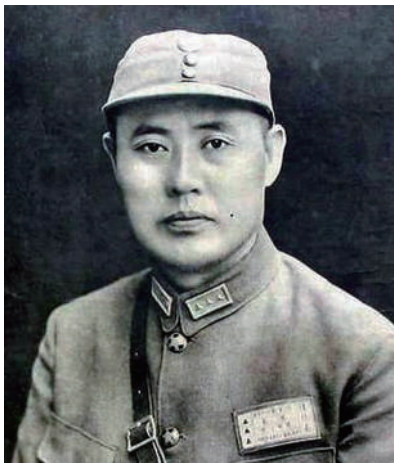


热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又将人们带回北平和平解放那段历史。其实,当时作为“投诚者”,傅作义步步为营,在每一步中都充满着矛盾和复杂的谋划。虽然傅作义在与中共和谈过程中数次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撤退要求,但这并不表示傅作义就完全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来往。

# 傅作义和谈前后三次打算出逃



## 第一次:打算去南京向蒋请罪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曾对其参谋长李世杰说:“我们研究了几天,想出一个办法,今天就准备发一个和平通电,为人民请命,以促进和平。我就自行解除兵权,交由李文代理,去南京向蒋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倡导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觉得怎样?”

李世杰对傅作义有此想法很意外,他不客气地说:“这样做是不负责的办法,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样办?领导着和罢,势不可能,一定会出大乱子;领导着战罢,兵灾结果必然毁灭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这几十万军队。再就蒋介石说罢,你既不愿走革命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蒋介石的路子,陪伴他殉葬。但你又不愿走打的路子,发一和平通电就走,

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也不会原谅你的。再就共产党方面说,你的和平通电是会得到同情的,你不起来执行和平,而放了一炮就走了,我想也会认为这个做法是有始无终的,既打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种行为。再就对自己说,也对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蒋请罪,蒋一定不客气地交军法处理,到那时又怎样说理呢?这个做法我找不出赞成的理由。”后来傅作义就放弃了这一想法。

## 第二次:想出国被南京政府拒绝

由于2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公函和新闻稿,将傅作义置于战犯、战败、以求自赎的地位,这惹恼了傅作义,傅因此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准。对此,国民政府负责同傅作义联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日记2月4日记载说:“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傅作义的字)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只是对傅表示“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

徐永昌明白傅作义想出走,虽然出国之事暂时搁浅,但徐永昌建议傅“莫善于先回绥远省(省会今呼和浩特)”。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永昌:“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也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与毛泽东会见之后,28日,国民党宣传部长、民主人士邵力子返回南京对徐永昌说:“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也就是说,傅

对走与不走非常矛盾,因为他觉得他若离开北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傅作义对出走之事犹豫不决。

## 第三次:想秘密去绥远未果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作义想在26日逃离北平。

而就在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因此3月26日傅作义致电南京方面称:“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着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着陆场,再行请派。”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不得不再次安心谋划他的出路。最终,他选择完全转向中共方面。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整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

(据《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历史研究》)

## 解放军俘虏政策增兵百万

解放战争期间,《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解放军之补充。“解放战士”由此而来。1948年6月,野战军兵力达149万人,按比例,“解放战士”有近百万人。数量如此庞大的“解放战士”,如何为解放军所用,是当时野战部队的难题。

1947年,西北野战军358旅两次进攻榆林,都未能攻克。指挥员开始思考原因。据调查,原因是“解放战士”太多。358旅政委余秋里在操场集合部队,“我一看,好家伙,黄乎乎一片(当时国民党军穿黄军装)”。东北野战军也出现相似的情况:1946年2月,保卫辽阳战斗,地形有利,火力密集,就是没有打倒几个敌人。调查发现,一些“解放战士”故意抬高了枪口。少数“解放战士”甚至将不良风气带到了军中,“背包叫老乡背上,或私自动员大车,并有打骂群众、抓车抓夫现象”。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决定,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1947年冬至1948年夏,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了以“诉苦运动”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整军运动。所谓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带来的苦。“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就是“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很多“解放战士”在诉苦之后,迅速成为坚定的革命军人。从而在和国民党军队的较量中,解放军逐渐显示出压倒性的力量。

(据《老年生活报》)

## 陈赓:军中幽默大师

陈赓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后来他被国民党抓住了,蒋介石想劝降他,假装关心地说:“陈赓,你瘦多了。”陈赓笑说:“瘦吾身而肥天下,这是校长你教导我们的呀。我看校长也瘦多了,身为一党一国的领袖,你瘦了,而天下更瘦,这是为何呀?”一句话让蒋介石碰了一鼻子灰。延安整风时期,康生指责陈赓说:“当年你要把蒋介石毙了,现在哪里要打那么多仗!”陈赓笑答:“那老蒋不就跟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我岂不成了反革命?”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康生自觉无趣,讪讪地走开了。

陈赓大将被称为“军中幽默大师”,连陈毅元帅都说:“陈赓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郭沫若曾写了个《武则天》的戏,叫大家去看。大家都觉得这个戏写得有点过,把一个封建皇帝写得什么都懂,还懂民主。郭沫若让大家发表评论时,大家都不说话。恰好那时郭沫若刚刚入党,陈赓就说:“咱俩介绍她入党吧。”大家会意地哄堂大笑。

(据《老年生活报》)

## 上海因何被推迟一个月解放



管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还未就绪,尤其是由于铁路运输一时跟不上,进入上海为稳定金融秩序而要使用的人民币还没有印好。为此,陈毅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党我军未做适当准备,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据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平津战役以后,中央曾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军队推进到哪里,钞票必须跟进到哪里。”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的,但在城市接管中留下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货币统一在超大城市中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货币混乱给解放后的城市带来不少麻烦,因此大力回收国民党的“金圆券”,但各地部队却带去了各根据地的货币,这引起了一场混乱。为了吸取教训,中央规定,所有解放区的货币

必须在长江以北兑换成人民币,解放区的各种货币一律不得过江。至于为什么需要4亿人民币,这是由当时的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根据回收国民党的旧货币初步计算出来的。

这4亿人民币是在东北、华北、华东三个地方的印钞厂印制的,钞票的印刷并没有耽搁,但是渡江以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于是,这4亿人民币集中调运到济南,再由济南调集40辆美国的道奇卡车,转运到丹阳,只要上海一解放,这4亿人民币就马上进入上海。但是直到5月初,这40辆道奇卡车还没有到达丹阳。这也是陈毅决定推迟进攻上海的重要原因之一。1949年5月27日,这些人民币连同从各解放区筹集的粮食等战略物资陆续运抵上海,为保证解放初期上海的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劳动报》)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被推迟一个月,一个重要原因是,陈毅在等一样东西——包括4亿人民币在内的一批重要战略物资。进入上海之前,党中央反复思考,如何将上海对新中国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有关4亿人民币以及进城所必需战略物资的考量,是因为它对于上海城市秩序的维持、对于建立新中国的金融体系至关重要。

资料显示,当年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线推进超过了预期,陈毅感到接